

拟剧理论视阈下：广场舞群体的自我呈现研究

崔良婷，吴琳琳*

池州学院体育学院，安徽 池州

收稿日期：2026年8月21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23日

摘 要

广场舞是当代中国最典型、最集中的群众性文化现象，参与者以集体方式运用身体来塑造特殊的自我场域。在戈夫曼拟剧理论视阈下，配合多个广场舞队的实地观察，对广场舞群体自我表现的实践及其意义做较完整的分析。研究指出，在“前台”中由程序性身体动作、仪式化集体的“集体欢腾”及对污名的应对性印象管理构成符号性表达，即以某种方式完成自我；在“后台”中又借助日常互动的感情资源、由家庭向公共角色的转化及网络联系，重新编织社会关系网络。上述自我呈现所依赖的动力来自集体记忆的延续、个体化时代的归属焦虑以及女性的主体意识。但社会污名与个体化问题同时存在，使得广场舞群体自我表达有“符号化认同”“情景性归属”与“污名化形象”三种悖论，需借公民的包容性达到从“自我呈现”到“社会认同”的跨越。

关键词

拟剧理论，自我呈现，广场舞群体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amaturgy: A Study on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Square Dance Groups

Liangting Cui, Linlin Wu*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Anhui

Received: August 21,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3, 2026

Abstract

Square dance is the most typical and concentrated mass cultural phenomenon in contemporary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崔良婷，吴琳琳. 拟剧理论视阈下：广场舞群体的自我呈现研究[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5): 1395-1401.
DOI: 10.12677/isl.2026.105164

China, whose participants construct a unique public self-field through collective physical practice. Based on Goffman's dramaturgical theory and field observations of multiple square dance team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forms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self-presentation among square dance group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front stage, square dance groups complete symbolic self-construction and realize self-expression in public scenarios through stylized physical movements, the collective effervescence generated by ritualized collective activities, and defensive 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response to social stigma. In the hidden back stage, groups reconstruct and expand their social network through daily emotional interactions,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from private family roles to public social roles, and online social connections. Furthe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self-presentation behaviors of square dance groups are rooted in the inheritance of collective memory,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xiety in 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 and the awakening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women. However, the coexistence of social stigma and individualization creates three paradoxes in the self-expression of square dance groups: "symbolic identification", "situational belonging", and "stigmatized image". An inclusive citizenry is required to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self-presentation" to "social recognition".

Keywords

Dramaturgy, Self-Presentation, Square Dance Group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广场舞所具有的巨大参与量及普遍的社会意义,已使其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特殊文化现象。无论是城市广场还是乡间空地,白昼各时段里,成千上万的中老年女性借助集体身体活动表演,来开辟自己的公共空间。而目前大众有关广场舞的认知大体是“噪音扰民”“抢占场地”一类的负面说法,对实际舞者所抱有的心理动因、感情需要或身份感并未做完整的分析与说明[1]。

广场舞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健身行为,而应理解为有关“自我呈现”的主要场合。戈夫曼拟剧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所经历的社会互动是“表演”,个体以特定“舞台”中的符号形式去控制、调节他人对自身的看法。就中老年女性来说,广场舞正好是家庭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过渡的途径,也是女性重获力量、塑造形象、得到认同的机会[2]。广场舞本身属于表演类的集体行为,又可作为中老年人“为自己而舞”的象征,无论怎样看待群体或个体,它所涉及的选择似乎自由,实则有历史逻辑的现实支撑,是社会变化中特有的记忆与历史片段[3]。

文章关注广场舞群体运用身体、空间及情感等完成自我呈现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文中把文献资料 and 理论思考做一结合,对已知的实证材料加以归纳,尝试提出有关广场舞群体自我呈现的总体性、综合性的分析思路或解释框架。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自我呈现”

欧文戈夫曼说明社会互动可类比于戏剧演出,“前台”要按社会规则来表演自己,“后台”是解构伪装、显露本真的状态。“前台”是表演者塑造好形象的场域,而“后台”是自由舒展、做准备的场所。广

场舞的实践正好有“前台－后台”所指的双重结构：当她们跳舞时，是以统一方式行动的成员；休息时，就彼此交谈、成为姐妹。

表演的惯习从本质上塑造了广场舞群体的精神特质，既内化于群体成员的精神世界，又外化于广场舞群体的日常生活。表演中的自我呈现是对传统的历史延续和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也是重新阐释对自我表达的价值界定与意义呈现。

2.2. 个体化理论与“群体性兴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高度集体化向个人生活重心转移的历史变迁，社会开启了“个体化”的历程。中老年女性从传统家庭共同体和单位体制中逐步脱离出来，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面临着孤独感和社会风险的增加。广场舞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联结机制，她们通过集体舞蹈重建社会关系、寻求归属感。

张兆曙将广场舞现象概括为“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在个体化浪潮中，人们通过集体性活动来抵抗孤独、寻找意义[4]。广场舞不仅作为中老年女性进行个体化实践的场域，更是个体化社会群体身份建构的一种表征。广场舞女性群体以40岁到65岁女性为主，大部分拥有集体生活方式的历史记忆，在流动的現代性的影响下，由于失去了集体和家庭等的庇护，中老年女性在获得自主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新型社会结构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孤独感日益增长。

2.3. 研究视角的综合

文章结合拟剧理论中“前台－后台”的思考、个体化理论所用的“社会联结变化”方法及身体社会学的“个体化实践”观点来三维分析。就分析角度而言，将从“前台表演：印象管理与符号呈现”“后台交往：日常互动与身份重构”“深层逻辑：历史记忆与现代诉求”三者出发，对广场舞群体的自我呈现研究做完整考察。三个部分是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前台表演是群体外在的符号表达，后台交往是内在的社会关系建构，而深层逻辑则揭示了驱动这些行为的历史与心理根源。

3. “前台”表演：印象管理与符号呈现

3.1. 身体展示：作为“表演”的舞蹈实践

广场舞所依附的基本形式是身体展示。中年以上的女性以统一着装、有规律的动作及既定的舞步来组织自身，把公共空间变为“理想化的自我”类场域。他们所做的表演既是针对旧式女性身体观的挑战与否定，也是对身体语言做审美乃至仪式上的重新安排。此时广场上不复有家庭中“妻子”“母亲”或“婆婆”的角色，而是舞者个体的集合，靠身体的力量来表明自己、确认存在的意义。

已有研究把女性主义带入分析视角，说明广场舞者所经历的长时间身体实践对性别角色做某种姿态性或形态性的处理，即以自我为出发点而“舞”地感受情感，最后达到能动意识的增强。所用的身体方法不单是劳力上的付出，亦可视为符号化自我之表现——舞态、面容乃至衣着都用来发出“我还年轻”“我依然有魅力”类的正面信息。广场舞按其本性来说是以身体“美”作标的表演，借由身体的运用重获自身魅力的认同[5]。

需要注意的是，对不同年龄、阶层、职业背景的广场舞群体而言，“主体性”的呈现方式可能大相径庭。例如，退休教师可能更注重舞蹈的规范性与美感，借此表达对有序生活的追求；而外来务工者则可能更看重在广场舞中获得的社交温暖与情感支持，其“主体性”更多体现在对归属感的主动建构中。因此，广场舞所带来的“主体性体验”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叙事所能概括。

“借光”这一概念揭示了广场舞女性群体的身体表达与生境：她们通过广场舞这项休闲体育活动打

破了传统的性别秩序,实现了与一般女性群体的区隔,同时实现了个体赋权与认同,以及获得了整体社会意义上的赋权与认同,最终构建起以广场舞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实现了社会关系重构[6]。

3.2. 集体仪式:从“个体之舞”到“集体欢腾”

广场舞不是单人表演,而应视为集体仪式一类的活动。所用时间一般为晚间7~9点,所用场地多是社区广场或公园空地,此时舞者都按约定来集会,由领舞者把一连串动作加以组织与引导[7]。这样有规律的团体行为恰好对应于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情感上的一致及对群体的特殊归属。

李钧鹏、许帅航曾把广场舞当作集体欢腾的一种形式加以分析,指出其中以节奏一致、感情相同及身体配合来完成个体舞蹈向集体欢腾的上升[8]。对广场舞来说,所用的仪式性表演正是由“自我”变为“我们”的契机。动作上统一、情绪上相合时,她们便可以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就过去或现在的集体记忆而论获得归属感。

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广场舞的“集体欢腾”机制可以进一步剖析:舞蹈中的同步动作与节奏共鸣,通过身体模仿与情感传染,在群体中迅速建立起一种“情感能量”的共享状态。这种情感能量不仅强化了群体凝聚力,也为参与者提供了即时的情感慰藉。然而,这种欢腾也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它高度依赖现场的身体共在,一旦舞蹈结束,集体情感便可能迅速消退,成员重新回到日常的孤独与疏离中。而这正是涂尔干所强调的一种在集体活动中产生的,令人难以抗拒的兴奋感、力量感与团结感——“集体欢腾”。这种“前台”的集体欢腾与“后台”的个体孤独张力,恰恰构成了广场舞群体自我呈现的核心矛盾。

广场舞作为一种以获得“集体仪式”感为目标的体验,参与者通过集体舞仪式的再现性和强制性,获得了强烈的群体凝聚力和归属感。中老年女性大多经历了集体主义时期的光辉岁月,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广场舞的集体形式恰好契合了她们的情感结构[9]。她们通过“共享故事”的编织来激活集体记忆,进行群体仪式的建构,再现了一种集体文化氛围。

3.3. 印象管理:应对“污名化”的策略

广场舞群体所遇到的“污名化”是来自社会的困境。有关噪音、场地占用的种种事例使广场舞“大妈”被划入“蛮横”“自私”“缺乏公德”一类的标签。广场舞造成扰民的情况若经媒体报道就会使大妈及其活动获得“污名化”。就负面形象而言,广场舞群体已着手运用各种“印象管理”办法来应对:把场地定在非住宅区、控制分贝、用统一服装表达“文明”感,或借做公益而使社会看法有所改观。

有关广场舞所处的想象性情景空间,文中用角色改造和集体表演这类方式来说明广场舞女性怎样以之建立情景性共同体。此处所说的“印象管理”应被看作对抗污名化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其自我认同的正面发展。借助“文明”“有序”“健康”这类形象,她们想表明自己不是社会误认为的那种人,是有条理、有素质、属现代的公民。而从主体构成角度考察广场群体的行为及其叙述,将主体表现同社会对“广场舞大妈”的负面说法做一比较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广场舞群体并非完全被动的“被污名化的客体”,她们在与社会互动中也可能采取主动,甚至带有争议性的策略(如集体性占用场地、对抗性交涉等),这些行为反映了她们在资源争夺中的能动性,但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污名化。因此,对“污名”的分析应避免简化为一元叙事,而需关注其双向建构的复杂性。

4. “后台”交往:日常互动与身份重构

4.1. 日常交往中的情感支持与社会关系网络

广场舞所涉群体的“后台”生活本身很充实。跳舞前后,一般有交谈、有生活信息的交换、有对健康

的讨论。这样的普通互动是情感上有力的支撑, 亦可用来缓解中老年群体没有工作、子女不在身边而有的孤独感。

已有研究根据参与式观察的思路指出: 广场舞所涉及的情景化交往对社区关系是重构性的, 其结果是社会资本的某种增加。广场舞不能只看作身体行为, 应理解为“媒介”, 此时舞者以之为媒介而完成社会接触或自我定位的任务[10]。广场舞有助于社区关系的形成或改变, 就关系角度而言它把传统地缘所指的区域变为新社交的可能空间。

从情感传播角度出发对广场舞做分析, 可得到有关群体内部互动的补充说明: 所涉的日常情感互动又使广场舞参与者回到曾经的“熟人社会”, 并且促成趣缘式成员关系的出现。就广场舞这一特有空间而论, 个体情绪是被共同经历的, 所依赖的圈层传播形式有利于把私人情感转化为群体现象, 也正好满足归属感在群体中成立的需要[11]。

4.2. 从“家庭角色”到“社会角色”: 身份的重构与转换

就中老年女性来说, 广场舞是“家庭角色”转为“社会角色”的一个契机。家庭生活里所扮演的角色是“伺候人的保姆”“被忽视的老伴”或“被依赖的母亲”; 到了广场舞团体中, 所处地位是“领舞者”“骨干成员”或“受人尊敬的姐妹”。此时的身份与价值都经历了一定程度的重新定位。广场舞女性通过广场舞这项休闲体育活动, 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秩序, 实现了与一般女性群体的区隔, 同时实现了个体赋权与认同, 以及获得了整体社会意义上的赋权与认同。她们不再是“被看”的对象, 而是“主动呈现”的主体——通过舞蹈展现自己的价值与魅力。

有关乡村广场舞的论述也符合上述结论。对内蒙古自治区 H 村广场舞队做过的分析清楚地指出: 所涉人员利用广场舞的某种空间形式来完成自我认同的更新、群体认同的形成或社会认同的增长[12]。就乡村本身来说, 广场舞是沉闷状态的一种打破者, 身体的扭动帮助人重新认识自己, 好像又置身于过去的集体生活之中, 这种新角色的取得正好能激发个体自豪感及对群体的依附感、归属感。

4.3. 技术赋能: 线上空间的延伸与自我呈现

智能手机大量使用以后, 广场舞人群所做的自我呈现也进入线上空间。用微信群、抖音账号传递有关舞蹈的视频、关于动作的照片或有关活动的消息, 有时还用来办比赛。微信群、抖音账号对广场舞来说是“后台”一类的延伸, 成员之间可以作具体的沟通、较深的感情交流。

已有研究对广场舞群体所做的线上互动做较完整的分析, 微信群之类线上工具的互动多为日常型、感情型, 社交软件有利于人际关系的维系。若从传播仪式的角度看, 广场舞本身是线下群体行为, 又可借由网络来完成仪式的延伸, 有关形式的延伸是教学、竞赛或表演性的广场舞, 而网络空间所涉的媒介既可为社交软件亦可为图像类应用(如视频、照片)。

线上空间自我表现对广场舞群体来说是认同感的加强。点赞或评论一类的行为可立刻得到回应及肯定, 属于“他者”所指的那种认可, 同时又为个体带来价值上的满足。已有分析表明, 广场舞人利用网络交流时已由“线下舞伴”转至“线上闺蜜”, 相应的人际联系较之以前更为确定、更为紧密。

5. 自我呈现的深层逻辑: 历史记忆与现代诉求

5.1. 集体主义记忆的延续与重构

有关广场舞群体的自我呈现, 有其历史上的深层联系。一般说来, 中老年女性早年所处的是集体主义社会, 那时的劳动、学习乃至休闲基本都属于集体性质的活动。现在以广场舞方式做集体舞蹈时, 她们所忆起的正是这类旧日的集体生活, “大家在一起”一类的感受遂成了安心、满足的来源。

广场舞看似是一种自觉自发的选择性行动, 实则包含着历史观念的现实重构, 凸显了这一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独特记忆与历史变迁。通过集体舞蹈, 她们重新体验了“集体”的力量与温暖, 在个体化社会中找到了新的归属感。周怡指出, 广场舞体现了出生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女性经历中的某些核心价值, 也反映了她们退休后转而对另类替代性共同体的期盼, “集体经历”“独生子女政策”是引发广场舞亚文化群体兴衰的掣肘因素[13]。

5.2. 个体化社会中的归属需求与身份焦虑

在个体化社会里中老年女性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子女长大、社会角色混乱、身体健康的难题, 使其情绪陷入空虚或惶恐。广场舞恰好是缓解此类焦虑的手段之一: 以团体形式跳舞可使心理负担稍减, 动作本身有舒缓效果, 人与人之间也因共舞而得到某种温暖、某种依托、某种安慰。

在对广场舞群体的深度访谈中, 揭示了她们“因何而跳”的深层动因: 填补退休后生活的空虚、排解孩子离巢后的焦虑与孤独、修复处于病态中的身体。这些动因反映了中老年女性在个体化社会中的多重困境。

然而, 这种归属感是“情景性”的, 是“人造的共同体”带来的短暂满足。舞蹈结束后, 她们仍然要面对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孤独, 这种“前台”与“后台”的断裂, 使得广场舞群体的自我呈现始终带有一种“表演性”色彩[14]。在广场舞这一想象情景空间, 通过角色重塑及共同表演等机制, 让广场舞群体建构了一个情景性的共同体, 但这种基于群体宣泄的归属感仍然是虚拟的, 流动的现代社会使群体的集体生活在稍纵即逝的背景下无法长久, 无法真正地嵌入社会共同体之中。

5.3. 女性主体性的多重表达与公民身份的建构

广场舞群体的自我呈现有着既定的社会意义, 所谈及的不单单是休闲, 而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价值表达。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 公共空间是身体表达的舞台, 是联合求权的场所, 是借自身状态来思考、来定位、来确认身份的场域。

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的转型背景下, 广场舞成为微观尺度上的“再熟人化”实践, 是对宏观社会变迁的响应与调适[15]。社会群体通过广场舞这一空间实践来抵抗人与人之间的疏离, 试图恢复正在瓦解的集体归属感。

事实上, 广场舞群体在自我组织与印象管理实践中, 已经孕育了某种公民参与的雏形。例如, 她们通过协商与社区管理者沟通场地使用时间, 自发制定噪音控制公约, 甚至组织公益演出以改善公共形象——这些行为在本质上已超越了单纯的娱乐需求, 体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与责任担当。这种“自发秩序”中的公民性萌芽, 为后续促进社会包容与理解提供了现实基础。

为推动广场舞女性社会身份的正常化, 需要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互动路径, 承认其平等的公共空间使用权利, 并通过社区层面的协商对话来化解矛盾。在个体化社会中生活更多的是以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来呈现, 而这种追求需要社会的协商与承认, 通过在社会交往领域有效嵌入理性沟通与相互理解的话语, 进而实现个体化社会群体互动的正常化。

6. 结论

广场舞群体的自我呈现是一种较难简单化处理的文化现象, 应从身体活动、空间表现、感情联系及身份角度来理解。戈夫曼拟剧理论视阈下, 广场舞群体在“前台”利用共同的身体语言及集会形式作印象的调控, 在“后台”以一般性沟通、以情相系的方式达到身份的重新塑造。

所讨论的过程本身是传统集体主义记忆的一种延续, 亦可视为对现代孤独(个体化)社会的对策。广场

舞群体以自我方式进入生活,把“被看”变为“主动呈现”,在公共场合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及身份定位。但有关的自我呈现又存在根本性的矛盾:按正面眼光看,广场舞给中老年女性以表达机会、以身份作实验的可能;若考虑现实限制,社会污名与个体孤立又使这种自我呈现很难完全摆脱“情景性”——她们有“前台”的狂欢与“后台”的忧郁,所追求的个体符号与社会污名正好呼应。

有关广场舞群体的自我表现,不能只看作个体的说明,亦应理解为社会现象。此处所涉的是中老年女性面对转型而形成的特殊主体性及价值感,是当代中国由集体主义走向个体化的历史过程的一种体现。广场舞不是单纯自然地出现、由某人发起的事物,而是时代隐喻的一种形式——即个体化时代所特有的群体兴奋状态。

未来,社会应当以更加包容和理性的态度看待广场舞现象,通过社区协商、公共空间共享等机制,使其成为“有意义的他者”被社会接受。如此,广场舞群体才能真正实现从“自我呈现”到“社会认同”的跨越,在个体化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基金项目

2025 年池州学院校级科研项目: (CZ2025RW13): 皖江凤舟的文化空间表征。

参考文献

- [1] 王芊霓. 污名与冲突: 时代夹缝中的广场舞[J]. 文化纵横, 2015(2): 74-81.
- [2] 熊欢, 王阿影. 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1): 49-58.
- [3] 杨君, 诸秋纯. 表演的惯习: 广场舞群体的生活方式变迁与自我呈现[J]. 天府新论, 2017(2): 125-132.
- [4] 张兆曙. 个体化时代的群体性兴奋——社会学视野中的广场舞和“中国大妈”[J]. 人文杂志, 2016(3): 116-122.
- [5] 赵鸿雁. “广场舞现象”及其“大妈”行为研究: 基于主体建构视角的叙事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6.
- [6] 葛晶晶, 王若光. “借光”: 广场舞女性群体的身体表达与生境研究[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24, 39(2): 41-45.
- [7] 王晓旭. 传播仪式观视阈下的广场舞呈现和个体获得: 以 A 坝广场舞队为例[D]: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成都体育学院, 2019.
- [8] 李钧鹏, 许帅航. 作为集体欢腾的广场舞[J]. 江海学刊, 2023(1): 137-147.
- [9] 刘建, 吴理财. 广场舞女性日常生活的群体互动与身份建构[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8(5): 8-14.
- [10] 张春燕. 作为媒介的广场舞——舞者的互动与认同[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北大学, 2017.
- [11] 许美琴. 广场舞——一种表意性行为[D]: [硕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15.
- [12] 卢菲. 乡村广场舞的社区传播与空间实践: 以内蒙古 H 村为个案[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20.
- [13] 周怡. “大家在一起”: 上海广场舞群体的“亚文化”实践——表意、拼贴与同构[J]. 社会学研究, 2018, 33(5): 40-65.
- [14] 开薪悦. 交往、认同和仪式中的广场舞: 基于合肥滨湖新区 H 舞蹈队的民族志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2015.
- [15] 程有鹏, 王婧萱, 路帅. 广场舞女性参与者的主体性再造——以女性人类学的个体文化为中心[J]. 尚舞, 2023(10): 105-107.